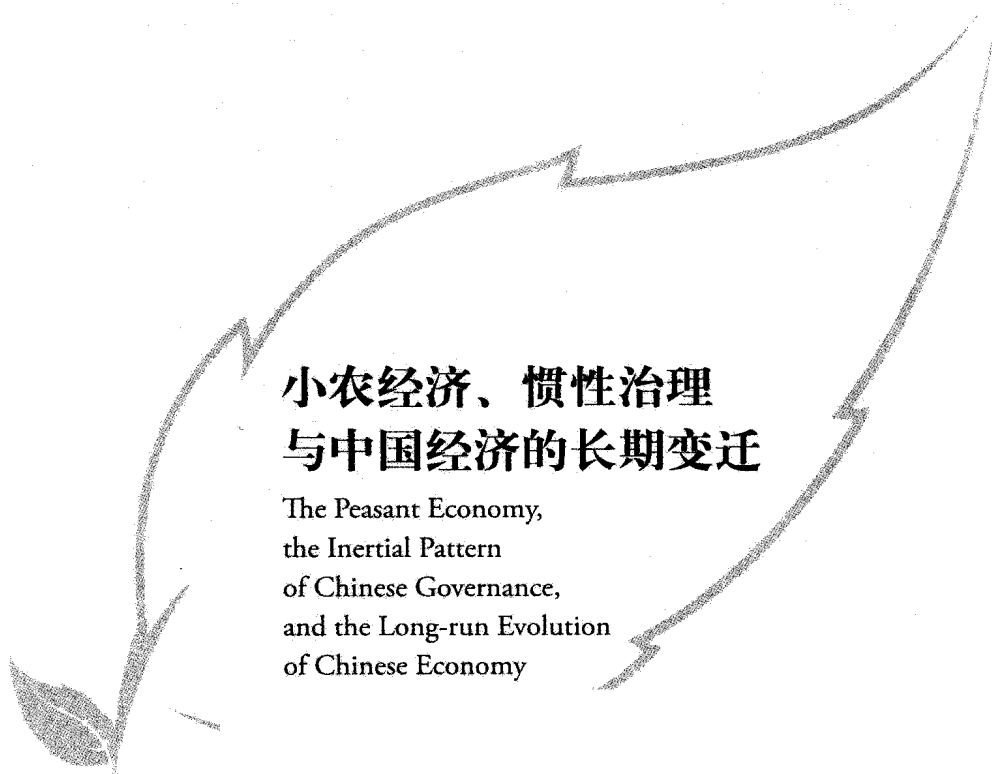




小农经济、惯性治理 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

The Peasant Economy,
the Inertial Pattern
of Chinese Governance,
and the Long-run Evolution
of Chinese Economy

赵红军 著



小农经济、惯性治理 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

The Peasant Economy,
the Inertial Pattern
of Chinese Governance,
and the Long-run Evolution
of Chinese Econom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赵红军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5432-1824-6

I. ①小… II. ①赵…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中国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5922 号

责任编辑 高 图

美术编辑 路 静

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

赵红军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3.7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824-6/F·322
定价 45.00 元

历史乃生活之师

——《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序言

韦 森

探究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随制度内卷(involution)和王朝更替而周期性兴衰的复杂原因,已成了自晚清以来国内、国际史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科学各界学者所长期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因而也似乎构成了一个经久常新的理论话题。其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在市场分工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起飞和社会现代化过程,相比之下,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华文明古国,却在清代中后期的内忧和外患中衰落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反差,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去反思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传统文化传统,以求为晚清以来各时期的社会改革和推进一个迄今未竟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理论反省和思想支持。赵红军博士的这部专著,又为这一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成果。

早在数年前在复旦读博士期间,赵红军就从交易效率的研究入手,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了诸多探讨,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研究思路,从而实际上为现在这部长时段、大范围的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博士毕业后,红军又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把自己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中所得出的一些理论洞识,运用到对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中去。尤其是200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研究一年期间,红军又专注于探究与思

考“李约瑟之谜”问题,综合诸家之说,写出了一篇全面的文献回顾长文(已经收入本书第2章)。从芝加哥大学访学归来后,红军又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深入探讨,最后写出了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从而构成了这部专著的基本框架。

自秦汉时期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建立到清代中后期,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一直是一个相对领先的国家。尽管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科学技术、科层政制、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曾长期领先于其他一些文明和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文景之治、两宋时期、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以及康乾盛世四次市场经济发展的“高潮”,但是,从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整体来看,传统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程度一直都不高。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周期性更替时期的战乱和外族入侵,总会把一个王朝数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和传统的科学和技术摧毁殆尽,直到下一个王朝的稳定和兴盛时期再从头再来。结果,一个有着久远文明历史的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却长期停滞于一个分工不发达和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小农自然经济状态。18世纪后半叶之后,随着国内市场分工深化和海外市场的扩展,尤其是在近现代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下,西方世界在经济上起飞了,同时也发生了一个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同一时期,清代中后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却在政治衰朽、内部动荡和外部列强入侵的打击下最后衰落了。这一巨大历史反差,就构成了国际经济史学界常说的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亦可译为“大分叉”)现象的主要部分。多年来,国际国内学界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所提出并数次热闹讨论过的“李约瑟之谜”问题,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对这种东西方社会在近代发生的“大分流”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反思和原因追问的一个副产品。

为什么传统中国社会静滞于一个市场分工不发达的小农自然经济而不能自发地转向现代工业文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一个学术各界经久探索、百家争鸣、众说纷纭且新说常出的一个研究课题。对于这些极其复杂的历史理论问题,赵红军在这部专著中所给出的解释大致是:中国适合于小农

经济的自然、生态和地理条件,导致产生了一种中国独特的政府治理制度和社会结构。在此制度框架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征的土地占有、财产继承、财政税赋、科举考试和行政管理制度,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固化成了一种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均衡”。对于他自己的这种研究进路,红军将之归结为一种“自然、地理、生态基础上的制度假说”。

赵红军博士的这一研究进路和理论假说,显然只是诸家之中的一家之言。这种研究是否能给东西方近代的“大分流”这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理论问题给出一个周延的解释,最好还是留给这部著作的读者自己去判断,但作为一个应邀作序者,我至少可以说这部专著给出了一个自洽的逻辑解释。

记得古罗马的伟大法学家西塞罗(Cicero)曾有一句“历史乃生活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的名言,当代的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也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判断。反思历史,在于理解现在,在于憧憬和构建未来。在经历了60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似乎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路口。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关键点上,如果我们把握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走对了路,一个强盛繁荣乃至经济可长期持续增长的世界强国就会在21世纪崛起。在此格局下,赵红军博士的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会增益于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是这部著作出版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之所在。期盼着在这个宽泛而又具有巨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中未来出现更多富有见解和洞识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赵红军博士沿着这一研究路径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

是为序。

韦森于2010年9月8日匆匆识于复旦

为《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一书作序

文贯中

赵君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的深层原因已有好几年。这次他在三易其稿后,又将定稿传来,希望我作序。他对我的信任使我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慨。和赵君成为文字之交,始于2007年初。当时他应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之邀,去该校做研究型的访问学者。赵鼎新教授和我是多年的朋友,知我对“李约瑟之谜”颇有兴趣,便鼓励赵君将他在访问芝大期间写就的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各种研究的长篇综述的初稿寄我。对他综述的深度和广度大为惊叹之余,我对他作为访问学者而甘于书斋生活的平淡,不畏辛苦地查阅各种中外资料,并愿意克服门户之见,超越自己的经济学训练范围,大胆进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系统动力学、生态地理学等等学科,广征博引,一心求真的治学态度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他访问芝大期间和他一来一往多次通讯后,2008年春他又利用来康州大学做学术报告的机会,特地来三一学院和我会面。记得与他同来的有他端庄贤惠的妻子和天真伶俐的女儿,我们一块儿吃饭与讨论使我度过很快乐的一个下午。就在这天我获知他们全家即将圆满结

束在芝大的访问,返回中国,自然更珍惜这次在美国长谈的机会。当面的接触和交谈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觉得人如其文,他不但学问广博,思想深刻,更有谦和而坚毅的态度,善良而正直的人品,十分幸庆中国有这样优秀的人才。

赵君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问题是有极为深刻的含义的。中国经济经历大起大落,其中原因不无令人困惑之处。不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从来没有抵达过世界的领先地位,中国在很长时期中是一个曾经傲视世界、万邦来朝的泱泱大国。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不但从这个为人仰视的崇高地位上很快坠落,而且偏偏又几乎落到世界的最底层。这里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触发了李约瑟的千古之问。中国经历的这种巨大反差是既没有经历大起,也没有经历大落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体会的。基于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经历,国人对近代以来身心遭遇的苦楚感到特别的耻辱、特别的耿耿于怀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令人惊奇甚至困惑的是,在经历这场大起大落之后,从1979年起,仅仅花了31年的时间却又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对于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国人感到十分自豪是很自然的,也是理所应该的。但是,中国究竟又是如何能做到这点的呢?以前为何做不到呢?如果对往日的迅速落伍的原因没有深刻反省,对今日的快速崛起没有准确的理解,则自豪必然变为自满,变为固步自封,必然重新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以为中国已经找到世界上最好的治理制度,就会漠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以及发展模式中的种种深层次问题,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当今中国急功近利者日多,越来越少的人对左右中国命运几千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再有兴趣,或对中国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陷阱和障碍有清醒的估计。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改革已经成功,GDP跃居世界第二,不久便可直追美国,重坐世界第一把交椅,似乎这种高速增长本身就已经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出成功经验,将之宣示于天下,其他问题已不必多思多虑,不然便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

幸亏中国有赵君这样有深厚历史感,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学者在。赵君时时在冥思苦想和上下求索之中,一心要理清中国在过去两千年

来发生大起大落的深层原因,并对李约瑟的千古之问找出自己的答案。他从考察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府治理模式的业绩来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并认为这种政府治理模式的固有惯性是造成中国从 15 世纪以后整体上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赵君又认为,过去 30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伟大变迁是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出现伟大奇迹的根本原因。以他的话说:“这 30 年的改革开放没有能证明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人民更加聪明,也没有证明这 30 年的技术进步比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技术进步高明多少,相反,它充分地证明了只要政府足够精明、充分务实并能适时地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推出相应的制度改革,摒弃掉那些阻碍人们、企业积极性发挥的制度和治理模式障碍,让经济体的潜力、企业和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的话,较好的经济发展绩效就是不期而遇的。”

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将中国近代的落伍归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入侵的理论,虽然容易迎合一般人拒绝自我反省,喜欢责备别人的心理,却无法回答麦迪逊所指出的,中国早在 14 世纪便已丧失人均收入领先世界的桂冠,16 世纪又丢掉科技领先的桂冠,19 世纪 20 年代,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 20 年最后丧失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桂冠。这些事都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即中国丧失东亚霸主的身份之前。所以,我们无法将中国的落伍主要归咎于西方的入侵。即使在中国丧失东亚霸主地位,东亚完全暴露于西方势力之前的将近 30 年后,日本仍能通过明治维新,通过内政的彻底改革而崛起为东亚强国和富国。再看 1978 年后,在以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事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而且还因为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和转型,由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局面更为加强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主要还是通过内政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这里内因还是起了主要的作用。

“李约瑟之谜”不但涉及为何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只能导致科技进步,却无法促进科学思想的萌发,而且涉及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享受长达千年以上的领先地位,却在近代急剧失落的原因。赵君不但从内因的角度对造成这种剧变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更进而思索使今日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所需的未来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些问题对一

般人来说,大概过于阳春白雪,过于远离人间烟火;对学者来说,这些问题又过于深不可测,陷进去也许会虚掷光阴,一事无成,甚至会有各种风险。可喜的是,赵君借助自己过人的精力和脑力,虚怀若谷的胸怀和沉潜求学的心态,找到了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并在自己的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又大胆推测中国未来各种治理制度的可能演变方向,不但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更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勇气,令人肃然起敬。我写这篇序,是希望赵君这本书不但能为大家引进新的视野,并能引起学界对中国经济长期变迁的深层原因的进一步讨论。

文贯中 于美国康州西哈特福市远思斋

前言

自诺思、福格尔以来,研究一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这一经济史研究范式似乎被经济学家发扬光大了。近年来,考察世界上最绵延流长的世界古国——中国——的长期经济变迁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注意力。从他们有关这一问题的解说来看,有所谓的政治学假说、经济学假说、社会学假说、历史学假说、系统动力学假说,还有生态地理学假说。单从经济学的解说来看,又有所谓的资源—技术—制度约束说,政治经济制度说,交易成本—分工—市场范围说、制度说等等。

在此背景下,本书试图从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府治理模式及其惯性这一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相对于现有研究而言,本书的研究应当归类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大类,但本研究又具有若干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准确地说,本书的研究可被归纳为“自然、地理、生态基础上的制度假说”。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定的产权结构乃是解释产权所在国经济长期变迁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在本书中,一定的产权结构仅仅是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政府治理制度与模式之中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当时中国政府治理国家的行政制度、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土地与产业管理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对人民的管理制度、对文化和社会的管理制度等都是当时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中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何以形成区别于西方的这一整套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本书认为,中国适合于小农经济的自然、生态和地理条件无疑是造就这一整

套与此适应的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忘却这一前提条件,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府治理制度及其惯性就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具有中国特征的土地占有、继承制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才得以建立,它依赖小农交纳税赋、劳役等来提供财政支持,依赖小农提供士兵和官僚人才来维持统治,依赖儒家思想、科举考试提供意识形态来驯化臣民。于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就巧妙地建立了相应的科举制度、税赋制度、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经过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实践,这一整套政府治理模式与制度最终在其他统治模式中胜出,形成并固化为一种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均衡”。对于后来的统治者而言,接受并践行这一整套政府治理模式不仅风险更小、成本更低,而且颇富生产和管理上的效率性。其中,小农的经济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他们的诉求在政治上得到体现,儒士只有与官府相结合才有出路,商人的经济利益被边缘化,官商勾结只是他们可供选择的唯一出路,新的思想和构思难以崭露头角。于是,中国历经多朝更迭,但雷打不动,仍然基本稳定在农本经济的老路上,难以顺利迈上工商经济的发展大道。

中国各朝的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兴衰变迁呢?其原因均可从这一政府治理模式的缓慢或不及时的调适^①,也就是现实状况与政府治理的不匹配当中找到根源。当小农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并且这一套政府治理模式能够适时地进行合理的治理调适时,经济就发展,王朝就能维持稳定,否则,当政府对外部环境变迁的信息解读不当^②,或者当政府治理措施失当或出现较大偏差^③并对小农经济基础造成很大破坏时,国家的财政、军事就陷入混乱当中,王朝就容易土崩瓦解。但这一天才的政府治理模式只要条件合适又会死灰复燃,再发青春。这恐怕就是理解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经济长期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奇迹?本书认为,那些试图运用对外开放、财政分权、外国直接投资、乡镇企业等任何单一的视角的解说都不具有解释力。从根本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经济、技术成就,只能用政府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迁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历史上,小农经济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改革

开放以后,农、工、商并重成为共和国新的治国理念。过去,儒家思想、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选拔官员的唯一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得到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学而优是入仕的一个条件,而并不是充分条件,大批具有能力的,经受实践考验的人进入了国家的干部队伍。历史上,中国的绝大多数王朝对国外采取了一种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政策和制度,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认真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建立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国历史上,皇帝及其官僚阶层构成整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千千万万的小农、工商业者成为国家的被统治者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王朝兴衰的基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成为国家的主人,皇帝在形式上消灭,阶级矛盾已然消亡,绝大多数的矛盾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本书中,诸如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学者的兴趣?秦朝为什么会走向覆亡?隋唐为什么会走向复兴?宋朝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治理的新气象?明、清的政府治理为什么会全面向内转型?国民党为什么会走向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从农村开始?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难以完成向工商社会的过渡?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再次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未来中国的政府治理路在何方?如此等等问题,都可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得到非常合理的解释。

也许会有人说,这一研究的很多素材似乎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常识。但将这些历史素材进行如此的政治学新组合,并能有效、系统地解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难道不正是本书研究的创新所在吗?也许会有人说,私有产权得到合法、公正的保护乃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理解中国历史上这套政府治理模式的惯性特征和模式,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国 15—18 世纪之所以未能自发、顺利演进到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原因,当然更不可能深刻理解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之所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坚持一百年”这一论断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深刻性所在。

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学界正盛行着一种着眼现实、忘却历史的倾向,

而本书却试图在这一大背景下,从经济学的角度再现历史,解释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并且笔者坚持认为,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过去的政府治理模式,就不可能找到未来二三十年中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未来,也难以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找到最优的前进道路。

最后,尽管本研究的这一大胆设想经过文献综述、微观行为上的展开、宏观原理上的阐释,对历朝历代的政府治理变迁的追索,对10世纪以后气候变冷以及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政府治理在当代的演进和未来发展的探讨这样几个部分的初步论证,但其中的缺陷和疏漏肯定是很的,相应的补充和不断完善永远是必要的。

赵红军

注释:

- ① 我国不少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封建王朝的“苛政猛于虎”和对被统治阶级的超额经济剥削是导致被统治阶级的抗争、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本书所说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一个比阶级观点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因为阶级观点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最激烈形式也就是阶级矛盾,并以此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分析方法对本研究而言的缺点是,它只适用于针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并不具有太强的解释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过去的阶级矛盾基本消亡,大量的矛盾已变为人民内部矛盾,比如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因此,使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治理模式概念与本书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像人们在飞机上瞭望地球一样,飞机飞得越低,地面上的差别就越明显;相反,飞机飞得越高,地面的差别就不太明显。要看清中国自秦汉以来直至今天的变迁,很显然,阶级分析只具有局部的解释力,而并不具有全部的解释力。本书的目的是解释全部,而不是局部,这正是本书放弃使用阶级分析法的基本原因所在。
- ② 这里的外部环境变迁并不单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环境的变迁,而且包括汉族与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他国家比如欧洲的国家实力和关系等方面的变化。
- ③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治理失当的情形非常之多,可包括上下之间的信息传递失真,比如皇帝和上层官僚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下层民众由于官僚阶层的信息垄断,而误解上层统治阶级的真实意愿;政府政策和制度在向下传递和执行过程中的失真、失范,比如,中央政府确定的“轻徭薄赋”的赋税制度会由于下层地主阶级的势力而完全转嫁给没有势力的自耕农或佃农;政府的行政制度和行政管理与经济制度、经济基础不相匹配,比如北宋时期的经济政策是积极的,但军事政策是非常保守和防御性的等等。

目录

第 1 章 导论/1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 1.2 研究对象与基本概念/ 5
- 1.3 研究方法、内容与结论/ 8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12

第 2 章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李约瑟之谜的争论与评述/ 17

- 2.1 引言/ 17
- 2.2 不同学科有关李约瑟之谜的假说对比及其评论/ 18
- 2.3 已有假说的方法论偏差及其评论/ 29
- 2.4 可供经济学家选择的新假说及其解释力/ 36
- 2.5 结论/ 42
- 2.6 附录/ 43

第 3 章 农民家庭行为:考察中国经济史上谜题的逻辑起点/ 53

- 3.1 引言/ 54
- 3.2 对人地比例失调论的评价/ 55
- 3.3 中国农民家庭面临的各种行为约束/ 60
- 3.4 农户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 63

- 3.5 来自代表性朝代普通农户家庭收支的证据/ 67
- 3.6 来自明、清江南棉业与丝业不同发展道路的案例/ 73
- 3.7 结论/ 77

第 4 章 小农经济与中国式政府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其惯性/ 82

- 4.1 小农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巩固/ 82
- 4.2 小农经济的效率优越性及其地位、影响/ 88
- 4.3 小农经济之上的惯性治理模式：框架与特征/ 96
- 4.4 小农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模式的经济性质/ 110

第 5 章 中国式政府治理模式在各朝的动态演变/ 115

- 5.1 中国历史上政府治理的内容/ 115
- 5.2 秦朝以前的封建诸侯式治理模式/ 118
- 5.3 秦朝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119
- 5.4 两汉时期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122
- 5.5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式治理模式/ 126
- 5.6 隋、唐时期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128
- 5.7 五代十国时期的列国式治理/ 132
- 5.8 10 世纪以前中国政府治理模式汇总/ 133
- 5.9 两宋时期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134
- 5.10 元朝军政合一的政府治理/ 137
- 5.11 明朝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140
- 5.12 清朝时期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144
- 5.1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方式政府治理/ 148
- 5.14 10 世纪以后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汇总/ 151

第 6 章 10 世纪前后中国气候环境变迁及其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冲击/ 156

- 6.1 10 世纪前后气候、自然环境的显著变迁/ 157

- 6.2 10 世纪后游牧民族与汉族力量对比的变化/ 163
- 6.3 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167
- 6.4 中国气候环境变迁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挑战/ 169
- 6.5 古、今气候环境变迁的影响机制、应对措施及其启示/ 175

第 7 章 15、16 世纪后西欧崛起及其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挑战/ 181

- 7.1 文化上的变革——文艺复兴/ 181
- 7.2 宗教领域的变革：宗教改革/ 182
- 7.3 欧洲经济的扩张/ 183
- 7.4 君主国家的形成与西欧的崛起/ 185
- 7.5 科学领域的变革——科学革命及其广泛影响/ 187
- 7.6 经济领域的变革——工业革命及其广泛影响/ 188
- 7.7 欧洲政治变革乃是一场政府治理方式的革命/ 195
- 7.8 欧洲各领域的变革对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挑战/ 197

第 8 章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与经济长期变迁的经验证据/ 201

- 8.1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与人口变迁/ 201
- 8.2 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治理模式变迁与人均 GDP/ 209
- 8.3 中国历史上政府治理模式与技术进步/ 214
- 8.4 数据附录/ 223

第 9 章 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政府治理模式的一次伟大变迁/ 258

- 9.1 改革开放前政府治理模式的试验与摸索/ 258
- 9.2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总特征/ 262
- 9.3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265
- 9.4 政府治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 270
- 9.5 对改革前后政府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检验/ 276